

（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九日出版）

本期目录

【微观历史】	“造反派，真的反了吗？”	朱学勤
【往事非烟】	清华文革的记忆	吴涤新
【书刊评论】	我读《清华蒯大富》	叶志江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微观历史】

“造反派，真的反了吗？”
——“奉旨”、“请旨”、“探旨”与“假旨”

· 朱学勤 ·

50年后检讨文革，不难发现一“异象”——群众性“造反”一开始都要求“被造反者”承认其正当，遭拒绝，方有游行、绝食、乃至卧轨，最后列队进京，请求“圣旨恩准”。如此“造反”，与汉语本义相去甚远，确实“史无前例”。或如毛泽东所问：“造反派，真的反了吗？”〔1〕

李逵嘱我为其新著作序，我即从此处说起。〔2〕

◇ 奉旨造反的开始

曾获毛泽东高度评价的“上海工总司”，是从“奉旨造反”开始。

王洪文现已去世，人们只记得他是“上海工总司”发起人，文革后下狱，罪名为“造反起家”。查1966年6月12日王洪文第一份大字报，即文革“起家”第一步，是批判厂党委不抓阶级斗争，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群众意见当耳边风。可见他并不是“造反”，而是“紧跟”1962年以后毛泽东突然拔高“阶级斗争”，切合王当年本身是保卫科干部这一红色身份。“工总司”另一领袖王秀珍也是以同一罪名“造反起家”下狱，但她参加文革时的身份并不是工人，属干部编制，是“技术员”、“劳动模范”，与王洪文类似，政治身份很“红”。查1966年王秀珍第一份大字报，也与王洪文类似，只是更具体：“厂党委对资方人员阶级斗争抓得不力”。他们都不是“造反起家”，而是与基层官员以及此后进驻的工作队“比左”——比后者更“积极”，在政治光谱上属更“左”一列。只是这样的“更左”不为基层党委、工作组“承认”，在单位内受压制，却受到毛泽东在北京不断接见红卫兵的激励，才一步步走向社会，成立跨厂、跨行业群众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成立这一组织之创议，也不是来自毛泽东激赏的“工人阶级伟大首创”，而是来自复旦大学“炮司”学生，以及南下串联的北京大学生包炮等人的提议。后者向工人披露“小道”消息：“造反”乃“圣上”旨意，是毛氏“文革”突破刘氏“四清”的新方向，这才消除这批人在那一年代必然会发生的安全疑虑。当包炮提出可组建“跨厂”、“跨行业”的“造反”组织时，在场者又有犹豫，担心这“造反”二字会被人揪住，质问“你们造谁的反”？此时黄金海提议：在“造反”这一名词前加“革命”二字，才让众人放心。王洪文再附议，加一个“总”字，即“工总司”这一简称之由来。

40年后，曾任王洪文理论辅导员并因此下狱六年的萧木先生反思文革，曾这样回访黄金海：

萧问：为何要在“造反”这一名称前要冠以“革命”二字，不知道这是语病吗？

黄答：“只提‘造反’，会把许多人吓退的，加上‘革命’二字好得多。要知道在当时，‘革命’是很吃香的呀。”〔3〕

萧木是从汉语本义发问，此前“革命”已属“造反”，再加“革命”，岂非“造反”之“造反”？黄金海答问，是回到60年代历史氛围，“造反”是“吃香”，“革命”是保险，既要趋时，又要避祸，这是那年代“政治正确”的时尚。〔4〕王洪文被推举为这一组织的“总司令”，也不在于他有多少领袖魅力，而在于他是共产党员、复员军人、保卫科干部，当时能将这三重“革命符号”集于一身者，无出其右。连王的一口“京腔”而非“沪语”，在那一年代的上海工人日常生活中本为弱项，但在此时也翻为强项：那一年代“突出政治”，来自北京的“政治正确”占据制高点，外省口音即使在当地，一登台即呈“短板”，知难而退。张春桥此后赴安亭谈判，凭他多年官场历练，肯定能看出王氏“京腔”字正腔圆，要比其它工人更能代表“工人阶级”，而正面谈判对手潘国平操一口上海腔普通话，虽能言善辩，却改不了底层工人之俚俗草莽，有待“提高”。此后张有意抬王抑潘，将前者培养为“工人阶级先进代表”，这才有王洪文后来居上，被毛泽东火速培养为接班人，却又始乱终弃的故事。

◇ 吓退与吃香

毛泽东在文革后期批《水浒》，说“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语义含混，不知所指。如果也包含对文革造反队伍的怨恨，那也怨不得别人，这正是他手创17年专制统治形成的社会化恶果。确实是“领袖不好”，才形成黄金海所言的普遍心理——“吓退”与“吃香”，既有消极恐惧，更有积极趋奉。如此“造反”，“这支队伍”在“上山”之前即已“招安”，此后“打方腊”，势所必然。由此才发生本文开头所述那一“异象”——汉民族素有两千年“造反”传统，却从未见“造反者”先请求“被造反者”“批准”，如此“造反”与汉语本义相距甚远，甚至相反，却在1966年下半年堂而皇之发生了。

11月8日“工总司”筹备成立，首先要求市长曹荻秋到会，“承认”他们为“革命组织”。后者很快看出其软肋，即向市属各机关严令“三不”：“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并称这些工人是“社会渣滓”。“三不”令下，众人惶恐，即有动摇与逃散。〔5〕此时，那个北京大学生包炮向工人作第二次鼓动：一不做二不休，赴京请愿，“请毛主席批准”，请得“大旨”压“小旨”，才能避免“秋后算账”。

1966年11月10日凌晨，“工总司”万人队伍冲向火车站，一千多人强行登车北上。他们之所以看中这列编号626次的列车，是因为它的终点站是北京，是“毛主席他老

人家住的地方”。“奉旨造反”不获“承认”，一跃为“请旨造反”，震惊中外的安亭事件，就是在这样的“造反”逻辑中发生的。

这是一群向地方政府说“不”，却向皇恩屈膝称“诺”的“请旨者”，他们困顿在那个四级小站，凄风苦雨，饥寒交迫，理应同情。张春桥奉令去谈判，站在卡车上推开雨伞，忍受风雨以及工人的叫骂，亦属难得。但是，安亭工人的这一“先进觉悟”并没有超过1905年1月9日的彼得堡工人，后者也是举着沙皇圣像——称其为“小爸爸”，走向皇宫请愿。安亭道上“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与六十年前彼得堡“小爸爸”可谓同义反复。即使与中国本土工运比，安亭工人也落于历史起点之后：1923年“二七”工人大罢工，铁路工人林祥谦尚敢提出“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此后四十三年，在毛泽东手创体制下，黄金海、王洪文不敢言“自由”、“人权”，只能在“造反”之前冠以“革命”二字，即使再加一个“总”字，那也与“造反”本意相去甚远，历史倒退了多少年？

另一被毛泽东激赏的文革标志性事件，所谓上海市委写作班“造反”，更是一场被夸大的神话。这些人在党政机关中生活多年，正统奴性比王洪文、黄金海们深厚，如果说工人是从“奉旨造反”走向“请旨造反”，这些人则是“探旨造反”，一步三探，探得“圣旨”方“造反”。

写作班缘起复旦历史系几位中、青年左翼教师，初名“罗思鼎”，似有古意，其实是谐音“螺丝钉”，也是在“紧跟”当年之“吃香”。1964年中共华东局、上海市委将其纳入麾下，拨“丁香花园”供其内部办公，对外署名“丁学雷”。“丁”即丁香花园，前清大臣李鸿章家族秘蓄小妾之私园；“学雷”，即当时的红色时尚“学习雷锋好榜样”。“丁香花园学雷锋”，岂非滑稽？而当时的授、受双方却浑然不知。“为革命而写历史”，本身即生活在历史的嘲讽中。

1965年毛泽东在上海私下策动文革，朱永嘉以史家身份为姚文元提供批吴晗《海瑞罢官》明史数据，自第八稿起，直接参与此文修改。1965年11月上旬，两人参加有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文教书记张春桥等参与的定稿会议。文革“造反”后，这一班人对内改称写作组，学科从史学扩及文学、哲学乃至自然科学，成上海地区舆论总管，听命于张春桥、姚文元。文革十年上海之所以不成立宣传部，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个班子已行使宣传部职能，学科“齐全”，足够使用。林彪事件后，这个班子为毛泽东提供专项服务，注释古籍大字本，密印专送。个别人从事与学者形象不相称的特殊任务：在不服张、姚文革新秩序的中学生里安插卧底，密写情报，则又超过了宣传部职能。

◇ 垂手肃立，甘为驱使

与北京梁效比，丁香花园可谓南书房行走，地理上属“南方”，政治上却比梁效更贴近中南海。“梁效”取名仅为北大、清华“两校”之谐音，比“丁学雷”晚出十年，仅在文革晚期“批林批孔”，既不承担宣传部职能，亦无缘介入中枢政治，也不从事与学者身份不相称的特务使命。“梁效”固不足取，但将南北两个写作班子简单并列，则有可能忽略上海写作班的特殊性，遮蔽那一年月知识阶层某些“特殊人”更为幽暗的一页。（6）

可想而知，1966年底要“策反”这样一群人，要比“策反”王洪文、黄金海困难。他们是“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者”，既是“包衣”又是“帝师”：对上为“包衣”——恭迎“圣旨”及张、姚“传旨”，垂手肃立，甘为驱使；对下为“帝师”——自恃“南书房行走”，高视阔步，斥“工总司”为“工字头”、“那帮‘小兄弟’”，语多轻蔑。1968

年，姚文元在京“接旨”，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但“南书房帝师”并不把身边的“领导阶级”放在眼里，还是闹摩擦，以致积隙成怨，酿成“《朝霞》事件”。〔7〕

1966年下半年，有复旦红革会、中国科大南下串联大学生许小昆、忻鼎亮等人与徐景贤接触，启蒙他们“造反”。徐事后回忆，他对这些大学生内心佩服，但不敢行动。这是因为写作班有内部纪律，张、姚不拨，他们不动。安亭事件后，“造反”成新朝“时尚”，写作班内喧嚷不已，唯恐落后，徐景贤内心彷徨，开始向北京张、姚请示，频频“探旨”。

12月12日晚，姚文元在电话中催促：“你们是写文章，还是上第一线？”遂有写作班议决“造反”，这是12月14日上午。徐当晚“再探”，又打电话向姚文元汇报此一决定并请示。这一次姚回答得更明确：“你们愿意革命，我们总是支持的”，还在电话中明示：“要把主攻矛头指向陈丕显和曹获秋，以批判资反路线打开市委缺口。”徐回忆说，“当时姚说的是‘革命’，不是‘造反’，这一点我印象特别深刻。”

这一电话无意中切合前述“造反”一定要加“革命”二字，可见黄金海所思所虑不虚。四十年后徐景贤有所反思，坦承当年心态：

“在打出造反旗帜之前，听到姚文元的表态，我就放心了。他们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是毛主席信任和支持的，他们同意我带领写作班和市委决裂，我就有了强有力的后盾与靠山，足以抵御市委的压制和打击了。”

1966年12月18日下午，上海市委写作班在文化广场宣布“造反”，“市委心脏爆炸，曹家后院起火”，一时轰动。朱永嘉代表“罗思鼎”宣布对陈、曹造反，徐景贤代表“丁学雷”全体作长篇报告，表态要“紧跟张春桥、姚文元”。这在当年各式造反宣言中亦为首创，那时的造反宣言都只说“紧跟毛主席、林副主席”。一个星期后，姚文元从“红机子”来电话，以罕见的兴奋语气告诉徐景贤：“毛主席看到了你们造反的消息；上海的学生起来了，工人起来了，机关干部也起来了，上海大有希望！”对徐景贤们此时还在担心的“内外有别”，张春桥代他们就近“探旨”，两次“探问”，毛回答得很慷慨：“内外有别，不是早就打破了吗？”

徐景贤闻言雀跃：我听了毛泽东的指示，兴奋万分，向写作班的全体成员作了传达。我还说：有毛主席撑腰，我们不能再犹豫了，我们要在全国全面内战中立新功！〔8〕

毛之言亦不虚，他是“无法无天”，一贯践踏党纪。就在此前半年，即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韶山滴水洞给夫人写家信，“黑话”连篇，放言无忌，早已打破“内外有别”。而“丁学雷”为臣下，跪惯了，一时直不起腰来。“探”得如此“内旨”，“有毛主席撑腰”，方敢站起来向昨日主子喊一嗓子。即使如此，有一个细节不能忽视。

12月17日晚，就在“丁香花园”已议决“弃旧图新”，次日即向旧市委亮出“造反”旗帜，徐景贤以工作需要为由，代“旧主”曹获秋写检查，向市委办公厅要求安装“红机子”，其实是为“新主”拉起一根与其通话更秘密的专线。“红机子”装成，姚文元果然关照徐景贤，号码只能让他一人知道，不得外传，徐立即派专人24小时守护“红机子”，守护这条生命线。

至此，北京与上海千里一线，京中“内廷”与沪上“外臣”频密互动。何为“探旨造反”，何为“再立新功”？何为“上海起来了”，毛泽东青睐这座城市超过他的政治之都？“红机子”知道“双城记”太多秘密，它应该列为“红色”文物，进入文革十年博物馆，真

正值得重视的，是40万上海临时工、外包工等底层工人“假旨造反”。“假”者，“借”也，不是“假传圣旨”，而是“借”旨为名，为自己切身利益“造反”，当时即被视为异类，遭“奉旨、请旨、探旨”者联手绞杀，至今未得正名。

◇ 真造反假造反

李逊置于全书篇首有一文革前体制身份等级图，按此排列，王洪文、黄金海等为工人上层，自喻“共和国长子”。在此之下，还有更多临时工、外包工，同工不同酬，无劳保，无福利，甚至无城市户口（“大跃进”失败后被哄骗返乡）。后者如果还能称工人，至多是“次子”，有临时工自称“小老婆养的”，可谓“庶出”。

“庶出者”第一张大字报即直指“人的尊严”。据“假旨造反”发起者沈福祥回忆，当时他们是去国棉十七厂看了王洪文的大字报，难以认同，回厂商议自己的命运，即想为自己政治上被歧视、经济上被压榨的处境造反。初稿写成后，也曾有争议。

沈福祥：我们公开提出要求人的尊严，这与当前的政治空气很不合拍，是否会带来麻烦？事实上17年来从不提倡人的尊严，从教育小学生开始就不允许发展人的个性，把人人变成一个个呆板的螺丝钉。从现在的眼光看，黎提出人的尊严，实质就是争取人权。

黎伯昂（执笔者）：我们“临兄”受人歧视，处处不平等，连起码的人的尊严也没有，还谈得上什么其他的东西？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如果连这一点也怕受到围攻，那我们根本不用动笔了。（9）

虽有犹豫、顾虑，这张大字报还是贴出了。可见“庶出”者“首出”，即比“螺丝钉”、“丁学雷”高出一头，也可与前述黄金海回答萧木的对话相比。在那一体制身份等级下，“政治觉悟”恰与人们在体制内外的地位成反比。

沈福祥去上海外滩，发现王洪文等人以“永忠队”名义贴出的大字报，是“炮轰”当时进驻国棉十七厂的工作队队长，占据有最好的位置。而在这张大字报的上方四五米，还有另一张大字报，题名“为什么”，提出14个疑问，直指当时的用工制度，落款也是一群临时工。人们驻足仰观，目光越过王洪文“永忠队”那一张大字报。沈福祥敏感到：人们在这张大字报上感受到一种“真造反”的气息。

什么是“真造反”？陈胜、吴广起义是真造反；攻打巴士底狱是真造反；马克思、恩格斯两位青年巨人在《共产党宣言》中宣称“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是真造反；井冈山武装割据，偏要升起一个太阳给老蒋看看是真造反。真造反是离经叛道，是独立思考。可是，由首席发动几亿之众去反对老二（刘少奇）、老七（邓小平），反对后来的老三（陶铸），发对再后来的老二（林彪），并支持学生工人、农民反对本单位大大小小的头头，也算是“造反”吗？这不由使人联想起斯大林、朱元璋。只不过这两人是秘密地干，而“文革”却是沸沸扬扬地征讨，造成一种大民主气氛。（10）

沈还注意到，仰观“真造反”者多为工人、市民，因为它涉入“假造反”不曾触及的禁区——等级身份与劳动制度，触及人权压制，每一成年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感同身受。而当时造反风头正健的学生群则是另一种态度：那些可爱的小将们却露鄙夷之色，不屑一顾，轻飘飘地走了。

小将们对这张大字报的轻蔑使我觉得十分震惊和失望。——为什么在红旗下长大的红卫兵却对生活中贫困中的临时工失去了同情心呢？为什么他们竟有如此敏锐而冷酷的政治嗅觉呢？为什么他们一看到这样的大字报，立刻能嗅出与“大方向”背道而驰的味儿，而且绝对不再去追问几个为什么，坚信上面红色司令部的指示绝对正确呢？他们在学校里读的什么书？是什么样的教育使他们泯灭了人性？这些热血沸腾的青年，血管里流淌的果真是热血吗？这样的一代青年，和“二战”时期的德国青年有多少不同？（11）

◇ 要转正、要户口、要同工同酬

沈福祥上述回忆留有当年的现场感，也有后来深化的反思。但与当下更多红卫兵回忆录相比，后者大多局限于校园，至今无人将反思触角伸及社会层面。如果说学生“不知稼穡之艰难”，那么同处一个阶级的“工总司”们，每天都在同一工厂、同一食堂、甚至同一家庭内与“庶出者”朝夕相处（王洪文自己的妻子崔根娣即临时工），却对后者遭受的身份压制视若不见，斥其为“干扰斗争大方向”，更令人心寒。

庶出者假旨造反，与王洪文、黄金海们奉旨造反同时。11月9日“工总司”召开成立大会，临时工、合同工亦曾参加。十天后，他们成立了自己的组织：“上海市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开始出现群众性劳动保障诉求，工总司斥其为经济挂帅。这一组织成立当天，曾去工总司总部请王洪文参加，即遭冷遇，拒不见面。此后，临时工们又以十万之众声援12月初上海色织二十四厂造反派与赤卫队冲突，希冀以“友军行动”换得“工总司”支持，尽管王洪文当时只能调动五千人，还是不理不睬。

为消除歧视，“庶出者”不得不把原初名“临时工、外包工”删除，代之以“红色工人”，改称“上海市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工司”，所发宣言比“工总司”更“红”：从五四运动鲜血、共产党“一大”明灯，直至天安门广场的五星红旗，将种种不相关的红色符号涂满全身，方战战兢兢吐露他们真实的要求：要转正，要户口，要同工同酬。（12）

这一真实诉求触及北京最高当局的分歧，由此引发“一月革命”，“假旨造反”百日未遂，即被镇压。而“一月革命”为何导致对他们的镇压，真相遮蔽50年，此处可略作申论。

1966年11月北京召开中央工交会议，国务院系统以谷牧为代表的经济官员担忧文革乱局扩展至工矿企业，将引发被压制已久的经济诉求，难有财力应对。12月4日，谷牧向政治局汇报，工业生产下滑，经济风潮已经出现，形势危急。这些经济官员原来就对文革不理解，此时以经济风潮为据，对毛泽东进一步扩大文革范围的要求，消极抵制。毛泽东视为要挟，怒称：“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

毛对“张屠夫”之厌恶由来已久。1953年斯大林去世，毛开始寻求苏式计划经济与官僚科层制之外的“中国式道路”。1955年以底层农民加入合作社的“敲锣打鼓”为依据，毛写作“中国社会主义高潮”系列编者按，痛斥邓子恢等人为小脚女人。1958年批周恩来反冒进，迫使后者流泪检讨。此后大跃进造成大饥荒，毛之“探索”在农村惨败，遂将视线转移至上层建筑、城市厂矿。此时文革在上层建筑已经发动，却为国务院经济官员所阻滞，不能在城市厂矿全面铺开，毛当然不满。此时他寄望于工人阶级的“首创精神”，一如1955年来自农村的“敲锣打鼓”，能为他打开被“张屠夫”卡住的瓶颈。毛与后者僵持了三个星期，终于等到从上海这一“工人阶级最为集中”的“先进城市”传来他急盼的“政治回声”。

◇ 造反、被造反坐在一起

1967年1月3日，毛曾令张、姚返沪，就地观察。此时经济风潮已从邻近上海的江苏等地蔓延至市区，因授权有限，张、姚二人抵沪后只是在第二线调研、听取汇报，并未有多大动作。

于此同时，从工交会议开始的“张屠夫”那条线为“维稳”所迫，提前运作。安亭事件后，上海保守派组织工人赤卫队也北上请愿，酿成“昆山事件”，京沪线再次受阻。1月1日，周恩来半夜打电话转告陈丕显，令其速去上海铁路局公安处，在那里等他电话。凌晨2点，陈丕显穿军装披军大衣，威风凛凛赶至现场。周以中央名义令其停止病休，出面主持工作，并在电话中下达指令，就地逮捕赤卫队负责人、铁路调度王玉玺。这是文革期间全国第一次动用专政机关直接捕人，此举显然是吸取安亭事件为张春桥抢得先机之教训，先下手为强。但也成为陈丕显主持工作后，对“工总司”等人的见面礼。布置完抓王之事，已是2日后半夜3点，陈披着那身军装赶至东湖宾馆，召集各大群众组织开会，由在场大学生起草

《告上海人民书》，呼吁市民、工人返回生产岗位。3日下午《文汇报》告急，有群众组织因闻言该报将被《解放日报》兼并，迫于生计，冲进编辑部门，宣布“接管”编辑业务。晚11点，周恩来再让北京日报办公室给《文汇报》打电话，传三条指示：一，报纸接管，没有这种先例，社会上只有封报纸，没有像你们这样的做法；二，不要在报纸上点刘少奇和陈丕显的名字；三，办报要慎重。

张春桥、姚文元抵沪，先见的是写作班，后见陈丕显，转达周恩来要他出来工作的指示。但陈丕显此前已得周恩来令，提前一日站上第一线，三箭齐发：逮捕王玉玺，主持东湖会议起草《告上海人民书》，令文汇报全文刊载。工总司虽在《告上海人民书》上领衔署名，但王洪文在东湖宾馆会议期间一直打瞌睡，未发一言。醒来后说：“这种会有啥开头，没有一个名堂！”

陈丕显再发第四箭：1月8日下午在锦江宾馆召开各部、委、局、办负责官员与群众组织联席会议，制定《紧急通告》。陈见朱永嘉在场，要他坐到自己身边，记录发言并整理纪要，朱此时已宣布对他“造反”二十天，陈一仍其旧，亲切招呼曰：“小朱，来来来”。朱内心也还是认陈“毕竟是市委负责人”（13），一听“招呼”，果然“来来来”，“造反”与“被造反”又坐到了一起。

纪要草成，朱请示陈，是否称《紧急通告》？陈应允，大笔签发。事后证明，这是一件大事，陈办成后应向周恩来报告，但他却让秘书向张春桥报告，或许示好张，或许希望张将自己这一功劳转呈毛泽东。不料此后形势急变，张将此功劳占为己有，而且将陈单独关押。此后多年，陈丕显亦不可能向周恩来那条线汇报。此事在陈可谓小误，但对文革全局却造成重大后果：呈报《紧急通告》切换至江青那条线，引发毛误判，以为这正是他盼望中的工人阶级“首创”，遂将此推高为“一月革命”，号召各省市群众组织向“走资派”“夺权”，文革失控，全国大乱，竟由此肇始！

朱永嘉等介入《紧急通告》，起初也浑然不知此事具“伟大历史意义”。朱从锦江宾馆返归写作班，将《紧急通告》带给徐景贤看，请示能否交《文汇报》发表？朱仅欲争取“双保险”，虽经陈丕显签发，最好还能征得徐景贤同意。徐未及思量，果然同意。

◇ 张屠夫救了混毛猪

李逊梳理上述史料至此，提示读者注意，《告上海人民书》与《紧急通告》相比，语气发生变化，前者是向市民呼吁，后者不仅有呼吁，还责令市委与公安局照此执行。这一提示很有见地，但由此而生的判断则可商榷。她认为这是“市委的权力和权威已经转移的标志”，而我以为相反，此处能看到的不是“市委的权威已经转移”，而是这一权威的“回归”，由此，或能触及“一月革命”的真相：

一，陈丕显接周恩来令——“主持工作”，是“一月革命”的始发动力。此时他虽被“造反”，但华东局第一书记、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并未免去，动用专政机关半夜捕人，令行禁止，“权威”犹在；

二，东湖宾馆与锦江宾馆两次会议，与会者发生重要变化。前者仅群众组织头头与会，后者则增加了市委各机关负责干部，包括强力部门。只有第一书记才能召集这些“张屠夫”，可见“权威”不仅“在”，而且在集体性“回归”。

三，两份传单语气有变，即两次会议参与者变化的结果。1月3日的传单出自在场大学生之手，是群众组织向群众呼吁，并无强制性，即名副其实的“传单”；1月8日的“传单”出自朱永嘉之手，机关文秘奉机关首长之令，向属下各部门书写指令，形式还是“传单”，内里已是“通令”，具强制性，语气当然变化。

可见“一月革命”之起，不是因为旧权力“转移”，而是旧权力“回归”，甚至是“强力”回归。如果说“一月革命”是“路线斗争”，那也不是文革这条线之“首创”，而是国务院周恩来、陈丕显那条线抵制文革乱局所致，是“张屠夫救了混毛猪”，而不是“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文革之荒谬即在此，谁是“一月革命”的发动者？不是别人，恰是“一月革命”此后指控的对像——陈丕显等“张屠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

那么，此后被宣传为“一月革命”功臣的张春桥、姚文元那条线，与此事的真实关系又是如何呢？

1月4日，因昆山事件京沪线再次受阻，张春桥确曾让工总司在上海铁路局的负责人谢鹏飞去把生产组织起来：“他们不管，你们管”。〔14〕张确有此话，但并未重视此事。1月5日上午，“告上海人民书”刊载于《文汇报》，张感到突然：“这件事我们事先一点也不知道啊！连发表‘告上海人民书’也不打个招呼？”

1月9日，《文汇报》再刊载“紧急通告”，张进而恼怒：“怎么搞的，刚发表了个‘告上海人民书’，又来了个‘紧急通告’？！”张回头训斥徐，为什么派朱永嘉去参加陈丕显主持的那个会议，并起草这个“紧急通告”？徐景贤转身训斥朱，为什么擅自代表写作班签署“紧急通告”？就在张训斥徐，徐训斥朱，朱无人代嫁，眼见大祸临头时，忽闻“中央贺电”到，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毛泽东点石成金，眼前这份“紧急通告”从“烫手山芋”变成了“一月革命”！

原来不仅张、姚“错过”圣上心意，连毛身边的《人民日报》在第二次转载上海传单时，也未跟上毛激越多变。《人民日报》1月9日以头版头条醒目位置转载此前“告上海人民书”，配发编者按，但到1月11日，转载《文汇报》“紧急通告”时则不甚重视，排在了第三版。众人皆未注意这个“第三版”，唯江青慧眼独具，理解毛此时所急所盼，将“紧急通告”与新华社电讯稿“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放在一起，专呈毛。毛此时注意力就在上海，读1月3日“告上海人民书”，正是他急盼中的“工人阶级首创精神”，为之大喜；再读江青专呈“紧急通告”，居然有那么多群众组织联署，几乎是

再现他青年时代“民众的大联合”，为之狂喜。毛将两份“传单”捏合成一个“东方的巴黎公社”，打破人民日报狭小格局“第三版”，欣然命笔，敕令四大中央机构向这32个群众组织发公开贺电，号召各省市仿效上海，大联合大夺权，这才是大手笔大格局，不仅刷新1949年中共见政以来的记录，亦刷新1871年自有巴黎公社以来的国际共运的所有记录！

◇ 对学生运动始乱终弃

可怜“一月革命”，原来是一场“张冠李戴”的“大乌龙”：本出自“张屠夫”那条线之“应急”，或可称“维稳”；却因江青所报而非陈丕显所呈，毛竟认为这是“工人阶级”反抗“张屠夫”的“伟大创举”，而张、姚、朱文革这条线则随之转向，再不提此前“恼怒”，立刻跟上“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齐声颂圣。张春桥暗示朱永嘉，不许提及此事原为陈丕显主持，将此“功”据为己有；朱心领神会，缄默不语（见朱永嘉《己酉回忆录》）；陈失去与北京周恩来那条线联系，打入“牛棚”，被迫“封口”，八年后恢复官位，又因邓小平已“彻底否定文革”，虽能出版官式回忆录，但对“一月革命”只能含糊其辞，等于第二次“封口”。如此“张冠李戴”，其实是多方乃至对立方有意无意间合谋，共犯“欺君之罪”：张偷梁换柱，朱守口如瓶，陈有口难言，眼睁睁看着圣上在京手舞足蹈，打破各项记录，却没有一人上前将真相道破。文革中把毛泽东“高瞻远瞩”捧上了天，“伟大战略部署”云乎哉？由此可见一斑，亦可一叹。

本文关注的是：1月8日在《紧急通告》上署名的群众组织有32家，“工总司”与其下属的二兵团、三兵团并立签署，甚至出现此前此后再也不闻声息的“上海工人安亭兵团”，学徒工组织也有两家，显然是凑数，以沪市俚语称——“阿猫阿狗都有”，为何不见那个拥有40万“临兄”的“红工司”？

原来他们不是没有参加，而是被轰了出来。“红工司”代表费敏章参加了锦江宾馆1月8日那次会议，但没有签字。费在现场争辩：“紧急通告”会给临时工、外包工带来压力，要求增加条文，结果在争执混乱中“耽误了签字”（15）。而据徐景贤令人编写的《一月革命大事记》，是这一组织的代表不肯签字，被轰出了会场。与他们一起不肯签字，同时轰出会场者还有回乡工人的“支农司”、农场工人的“农司”。这三个组织后来都被视为“经济主义组织”，被勒令解散，严加批判。

前文已述，如果说文革时期上海地区还有什么真“造反”，只能是红工司“假旨造反”，假作真来真亦假，此时却遭到“奉旨、探旨”者与“走资派”的联合绞杀。“一月革命”虽为乌龙，乌龙也成垫脚石，参与那一神话的三方都踏上了一只脚，踩在了他们头上。（16）“假旨造反”仅为隧道中途的瞬间一闪，照亮了这一阶级的真实处境。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只有从欺骗性的“政治挂帅”向后回转，才有可能触及这个阶级的真实处境，走向这个阶级早已失落的解放起点。沈福祥们距“工总司”远，离林祥谦近，距彼得堡1月9日远，离安源1921年近，可悲的是，这一步不是被吴佩孚镇压，而是被“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本阶级自诩的“革命长子”、以及“革命文人”联合镇压，历史的起点再一次被推远。

文革中曾有“毛主席去安源”巨幅油画，单张印刷九亿多，堪称世界之最，此时已成讽刺。毛1921年赴安源即为“经济挂帅”，从工人的经济诉求入手，组建工会，发起罢工。此后赴京登基，抛弃“经济挂帅”，强调“政治挂帅”，则与1921年判若两人。1957年鸣放初起，各地曾出现类似安源当年的经济风潮，毛批示：“工人要看清大局，不要闹事情。在此期间，不要提出福利工资问题，一致对付反动派。”（17）1967年

“红工司”再起，毛干脆以“经济挂帅”罪名镇压之。1967年在全国范围镇压工人的这一民生诉求，〔18〕1968年又从政治上号召“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其实是对学生运动始乱终弃，以“工宣队”掩护“军宣队”，帮他做一次穿工装“宪兵”而已。

◇ 召之即来，挥之即去

就“工总司”而言，从“奉旨造反”即排斥本阶级底层“兄弟”，到一个月后与陈丕显、朱永嘉共聚一堂，将“红工司”们轰逐出去，足见“革命新贵”的偏狭与短视。昨天他们被市委歧视为“社会渣滓”，转过脸来却视本阶级底层为“革命渣滓”，只许自己“革命”，不许他人“造反”，显露出他们昨天还在反对的“赵老太爷”心态。当年流行一时的列宁曾用《圣经》名言：“勿为一碗红豆汤，出卖长子继承权”，其实是一群自以为是的“共和国长子”，为那碗“红豆汤”，出卖了40万“庶子”的“生存权”。至1969年“工总司”改称为上海市总工会，他们也曾勉力挣扎，如恢复工人文化宫、组建工人夜大学等，但大限已至，限定这些人有心无力，行之不远。从“社会渣滓”到“革命新贵”仅一天，此后为“这一天”各领刑期十年、20年，他们的结局并不比沈福祥们好多少，甚至更惨。待刑满出狱，黄金海们走出“提篮桥”，当年的“领导阶级”在哪里？不是“领导一切”，而是整体消亡。安源乎、安亭乎？其实都是“临兄”、人数更多的“临时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也许只有到这时，这群“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才有可能醒悟。

至于“丁香花园”里的左翼文人，他们为“巴黎公社”而悲情自许〔19〕，数十年念叨“革命死了，革命万岁”。那就请他们记住1967年1月8日这一天，他们对“巴黎”的工人干了什么，这一天之后又干了什么？林祥谦当年还有施洋律师并肩作战，40年世异时移，施洋之后裔早已蜕变为“丁学雷”，走进那座脂粉气浓郁的私密花园。让这样的花园文人谈论公社起义，且不论公社对错，首先是对公社精神的羞辱。同样是50年后反思，他们是否有勇气把马克思的这句名言颠倒过来喊？

——“革命万岁，革命死了”，“革命”是在高喊“万岁”的那一天，被“万岁爷”和他们这群奉旨、请旨、探旨者连手，亲手掐死！

一部文革史，是多种人物、多种力量、乃至多种理念被毛泽东始乱终弃的历史。只要连接文革史两端——1966以“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始，1976以全民跪诵“专政理论”终——即可见这场“继续革命”之起落，距离有多么遥远。毛发起“造反”，又掐死“造反”，既有西方红色浪漫，也有东方五斗米教、天国圣库制杂拌，还有拜占庭式的权术黑暗。由于早年所受教育不够，毛的理论能力远低于他的政治抱负，以致其晚年思想越接近生命终结，越形混乱。但“造反有理”的底线，在他发动文革之初即已划出，清晰可见。这一说法起源于1939年他庆贺斯大林寿辰的延安讲演，当时毛在野，正是他对当朝者“造反”的时候，怎么都“有理”，当然不设限。但到1966年8月1日，毛泽东重提“造反有理”，给清华附中学生覆信——即点燃红卫兵运动烈焰的那封信，即开始悄悄设限。从现存盘案馆的覆信底稿上看得很清楚，那封信由秘书遵嘱起草，原稿引用了他1939年的说法，但毛泽东在此处亲笔添加“对反动派”四字，全句成：“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热烈地支持你们”。

1966年夏天在中国气象史上也是高温，绝大多数青年学生被那封信里的“热烈支持”冲昏了头脑，没有注意此处另加的四个字。年长者却有本能反应，一时“有理”，不忘“有限”，黄金海之所以对“造反”添加“革命”，徐景贤即使在宣布“造反”之后还要“一探再探”，就是对这一底线的本能反应。1967年2月，湖南中学生杨曦光提出“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毛早有预感，此前一年即立下戒律：“无产阶级专政”只能“局部

改善”，不能“彻底改善”，杨因此获刑十年。毛的“造反有理”不仅有对象限定，还有时间限定，1967年上半年即发出警告，“现在是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

1968年清华园武斗失控，毛派出他的8341部队指挥“工人阶级”，以3万人“工作队”开进这所大学。这是“波拿巴工作队”，超过“刘、邓工作组”百倍。蒯大富只记得反“工作组”曾获“圣旨恩准”——“造反有理”，却忘记“造反有限”——8341是毛泽东“亲兵”，只能跟，不能反。蒯和他的战友以棍棒、长矛迎“亲兵”，终于走到“造反”终点。

7月28日深夜2时，毛已服睡药入寝，突接周恩来电话，清华发生流血事件。毛从睡梦中惊醒，脱口而出：“造反派，真的反了吗？！”这是黑暗中的闪电，足可划破1968年的中国夜空。所谓“奉旨”、“请旨”和“探旨”，这里才是“圣旨”之底线，“黑手高悬霸主鞭”。紧接着召见五大学生领袖，毛再吐其黑话史（20）有记录以来最黑的一句：“你不是要抓黑手吗？我就是黑手！”

从这一夜开始，“造反派”用后见弃，大势已去。至1976年毛泽东去世，天平已倒向“张屠夫”们——官僚阶层，此后的接鞭、执鞭者自然是这一“新阶级”。10月6日，毛泽东尸骨未寒，怀仁堂事变即已发生，张春桥等锒铛入狱。又三年，推张入狱者也被推下船，新胜者组织“正义路法庭”审判。后者不敢触碰毛氏神龛，只审判神龛之下“传旨”、“奉旨”、“探旨”者，被判者也不是没有理由喊一声“冤”。但他们不应忘记“正义路”是从“丁香花园”逶迤而来，途中虽有一次曲折，却还是同一谱系上的“家族相似”。早于这场审判15年，是“丁香花园”开始了“硬装樗头”（21）之作业，正是当年指鹿为马，才有此后指马为鹿，请君入瓮。也因“家族相似”，他们曾以为是“南书房行走”、“共和国长子”，贴近“家族继承权”，为此，不惜出卖从吴晗到“三家村”，从“炮司”到“红工司”等一应“庶出”者，剥夺其“生存权”。

“造反派，真的反了吗？”他们没有反，“奉旨”、“请旨”、“探旨”者，未上“梁山”已“招安”，齐齐打“方腊”。因此，无论是面对毛之“黑手”，还是面对邓之“审判”，他们确实有理由喊“冤”，而且是双重的“冤”。这群可怜的冒牌“长子”！最终是被另一群早就凭“血缘”自承为“嫡出”者，指认其“庶出”，一把推了下去。

五十年前“造反”，十五年后“审判”，中国史的漩涡就是在这里，转出又一轮循环。

（本文所涉史实，除专注外，皆出自李逊及此书，论述则由笔者承责，谨此致谢李逊，恕不一一。）

（朱学勤为中国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注释：

1，陈长江、李忠诚：〈跟随毛泽东二十七年〉，《共和国历程》编辑委员会编：《共和国历程》，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中卷，第1133—1134页。参见唐少杰“‘文化大革命’的一首断魂曲”，华夏文摘增刊614期，文革博物馆通讯447。

2，此书梳理当年发生在上海地区机关、厂矿里的“造反”主流，或可称“正统造反”，本文为其代序，大致范围亦限于此。除此之外，文革中还有“另类造反”，如遇罗克反抗血统论、全国范围临时工“红造总”、湖南地区“湘江风雷”等。后者大多发生在校园大、中

学生，我曾称之为“思想型红卫兵”，他们一度为毛利用，亦曾与本文论述的“正统造反”短暂汇合，后经“一打三反”、“清队”、“深挖五一六”镇压，亦遭“正统造反派”打击，走向独立思考，为文革后的思想解放埋下伏线。我本人青少年时代之启蒙即身受后者之惠，曾在二十年前旧作“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有所论及。

3，此为李逊听萧木所言。

4，李逊曾听萧木先生言，当时工总司发起人之一女工徐美英曾遭其父亲怒斥——“我老爹听说我在厂里造反，气呼呼跑来找我，一见面就是劈头盖脸一顿臭骂。他说：造反，历朝历代都是杀头大罪呀！你一个妇道人家去轧这个闹猛做啥，真是昏了头啊！要不是你已经出嫁，我今天就打断你两只脚骨，看你还怎么去造反！”徐美英向其父解释：“我们是响应共产党、毛主席号召造‘走资派’的反，是‘革命’的造反，不是反对共产党、毛主席的‘反革命’造反。”这一“革命轶闻”不仅真实而且典型，验证当时人们闻“造反”而恐惧的普遍心理，又听说是为“革命”而“造反”，方能克服恐惧。

5，十年后官僚体系恢复重建，“清理三种人”重算旧帐，当可检验工人们的这一“心病”并不多余；又十年，换一茬年青者更以跪姿请愿，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回到这一要求，一定要当局承认“高自联”为合法，并保证不“秋后算账”。二十年两代人，体制不变，“心病”难变。

6，写作班后期也做过一些好事，如出版知青数理化自学教材、《学习与批判》、《摘译》（自然科学版、社会科学版）杂志等，后一类出版物充塞极左教义，但在文化荒芜年月，客观上也发生一些普及知识的作用，不应一笔抹煞。其具体成员也应区别，既有一心想圆文学梦却又只能服从党召唤的萧木，也有入彀不久即反叛、文革后大彻大悟的戴厚英。即使如徐景贤晚年，对写作班当年迫害知识界有一定程度反思，虽不到位，也不宜忽视。也有余秋雨这样的双开人物，文革、改革两个时代都能吃得开，畅行无碍。后者之得志，不在自身，而在其置身的这两个时代：文革虽被否定，但体制所需未变，写作班本质为御用，从“文革写手”到“文化大师”，“主”不变，“奴”亦不变。朱永嘉刚出狱时有所反思，但近年则持另一心态，虽以解释并维护“天子心事”为己任，诸多回忆亦有史料可读，不必因人废言。但他怒斥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张闻天，称后者为“佛头泼粪”，要李锐等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见朱永嘉2009年5月10日，“说说庐山会议这件事”），则令人想起他年轻时使用的语言。此文要害不在于偏袒施害者，苛责受害者，而在于投石问路，为庐山会议翻案。此案一翻，也就为批《海罢》发动文革翻了案，由此，也就为朱永嘉本人参与批《海罢》翻案。庐山会议是联接朱永嘉参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心节，故而他非要“说说这件事”不可。

7，1974年写作班已改称写作组，主办文学杂志《朝霞》，创刊号及第二期有三篇小说被“工总司”认为是影射，兴师问罪，遂成内讧。

8，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寿宴，毛举杯祝酒：“祝明年全国全年内战”！数日后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传达这一旨意，稍有柔化，改称“全国全面阶级斗争”。但徐景贤2013年《最后的回忆》再次确认毛这一原话，并说明是在从姚文元上述电话中听得，逐字记录。徐在这里虽表态要为“全国全面内战”立新功，但在1967年果然发生“全国全面内战”时——各省市皆因夺权派战，爆发大规模持续性热兵器武斗，上海却很快稳定下来，并未进入“全面内战”。个中原因与张、姚有上述优势，一手通过写作班控制舆论，一手通过“工总司”控制社会局势相关。文革时期的上海之所以称“首善之区”，未有第二次大乱，秘密即在这里。

9，沈福祥，《峥嵘岁月》（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10），页125。

10，同注9，页129

11，同注9，页130

12，40万人在街头集会中相互辨认，有一寒酸而又准确的自称：“临兄”。听一声“临兄”，即可认出对方是同样的编外零余人。此一细节可比列宁所言工人无祖国，听一声“国际歌”，即能辨认出阶级弟兄。

13，朱永嘉《已申春秋——我对文革初期两段史实的回忆》P194，2015年香港大风出版社

14，此语出自2015年5月19日李逊采访谢鹏飞，谢回忆转述。此事从1月4日救援运输，发展为1月9日“接管”上海铁路局，对经济形势有重大影响，不亚于《文汇报》群众组织“接管”编辑业务。张春桥将铁路“接管”也曾汇报给毛，囿于文人重意识形态不重经济，他并未在意此事具全局意义。毛亦有此偏向，只是他的文人浪漫处于最高权位，可任性发挥，张步步紧跟，亦有不及。毛抓住文汇报一事小题大做，向高处急推，将群众迫于生计之“业务接管”上升为“政治夺权”，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对铁路局“接管”虽予表扬，并未予以同等重视。如此畸轻畸重，与当时周恩来对《文汇报》“接管”持三条保留、对K14次特快驶达首都打通京沪铁路线分外重视，适成反照。

15，沈福祥，《峥嵘岁月》，2010，香港：时代国际出版社。

16，当时的临时工、外包工等是以日计酬，因经济压力不敢擅离职守，只能坚持每天出勤（2015年5月19日李逊采访谢鹏飞，谢坦承此一关键点，亦为难得），即使参与造反活动，也只能坚持“业余闹革命”，不可能像工总司那样可以在八小时内离开岗位“闹革命”，此后“经济主义妖风”之恶名却加在这些人头上，此其一。其二，他们虽然提出经济要求，但因没有可衡量的工资等级标准，即李逊所言无“政策资源”，临到“走资派”签字补发工资，却没有他们的份，实可谓“背恶名而无实惠”。其三，即使如此，红工司当时的实际行动也已打破了经济主义妖风这一恶名：1967年1月上旬，列车运行瘫痪，“红工司”组织铁路系统临时工编成临客102次乘务组，与京沪特快14次挂为同一列，并任命一位女临时工金月雯为正车长，另一位姓张的正式工为副车长，1月6日开出上海站，节节北上。周恩来大喜过望，特命国务院派员去北京站迎接，接见金月雯等全体司乘人员。人民日报与中央广播电台专题报道，将14次特快誉为“第一列红色列车”，一时轰动。但工总司却不愿临时工分享荣誉，在红工司负责人赴京参与周恩来接见途中，竟用轿车跟踪并冲撞他们去机场所乘车辆。（李逊书，P322）那位张姓副车长后来被工总司推举为中共九大代表，而金月雯为代表的那群临时工则消失无闻，功劳全部归于工总司名下。

17，毛泽东：〈组织力量，反击右派的猖狂进攻〉1957年6月8日，载《毛选》第五卷。

18，毛在这方面不如江青。1966年12月18日接见北京大中学校学生组织是提及临时工、合同工造反，江明确表示同情；12月26日晚，她接见这一群众组织——“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称“红造总”，曾声泪俱下。这一表现可视为演员作秀，也可视为她过于感性乃至神经质，但不能排除她因自己出身寒微而同情底层的真情部分。“红造总”是

整个文革期间唯一的全国性群众组织，仅存在一个月，即被毛签署中共中央文件，下令取缔。毛有出身底层的叛逆性格，但他更具韩非子或马基雅弗利之权术，底色可见孟锦云回忆毛与中南海服务员谈一个女子落井，如何奚落那个下井救人者为呆子。对毛的这一底色，江青凭她那点文艺理解力，实难望其项背。

19，语出朱永嘉闻讯1976年10月6日怀仁堂事变所言。文革十年，大陆中国时时将自己比附为“巴黎公社”之“创世纪”，连西方左翼知识界亦为之吸引，其实是一部多幕滑稽剧。第一幕来自北大校园，一张纠缠于人事之争的低端大字报，竟被毛泽东拔高为北京“巴黎公社”宣言，这大概是公社有史以来所遭遇的最为骇人的涂鸦记录。不过半年，“一月革命”又被毛泽东拔高为上海“巴黎公社”，此后突然焦虑“党往哪里摆”？竟以“改变国家体制牵涉国际承认”这一奇怪理由，下令改“公社”为“革命委员会”。可怜的“巴黎公社”，在上海尽管是涂上了小丑油彩，上演了滑稽山寨版，也只存在了18天，此为第二幕。此后“全国山河一片红”，毛以“三结合”取代“巴黎公社三原则”，已经彻底掏空了“公社”，但盗用“公社创世纪”之文学比附，还时时在两报一刊欢呼各省建立“新政权”的连篇社论中闪烁不定，此为第三幕。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基本教训——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旧国家机器，被中国式波拿巴政体取代，要“打碎”的不是“国家机器”，而是对这些“新政权”的反抗者。“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只是借文革之名密集重补斯大林式的“镇反”与“反右”。所谓“革命委员会好”，确实是毛泽东一大发明，如果在语词上还与法国、俄国革命传统有一丝联系，那也是将雅克宾的红色恐怖、波拿巴的军管，乃至捷尔任斯基的契卡集于一体，与“公社”风马牛不相及。1975年批林批孔，毛将他这一生的政治追求作最后了结，一言以蔽之——“百代皆行秦政制”。此后再不提“巴黎公社”，无论是来自西方左翼之发挥，还是中国信徒之引申，皆可谓蛇足聒絮。至1976年10月6日中国版“热月事变”，“丁学雷”突然呼喊“巴黎公社”，无异于塔列朗或富歇呼唤“巴黎起义”。这不是法国式的“悲情”，而是中国式的“矫情”，是指望他人为其“火中取栗”。“栗”早已被食言者食空，即使如工总司这样的“工字头”，也没有义务为“丁香花园”上街当炮灰。当年上海市民闻讯北京事变，是疏离、冷漠乃至幸灾乐祸，不仅证明“巴黎公社”距离这座城市实在太远，甚至证明1920年代以来左翼文人构建这座城市的“阶级属性”，那一整套说辞是自欺欺人，整体破灭。

1976年“雾月”，上海无“战事”。“上海起来了”？上海沉默了。“这也是一道闪电——沉默的闪电，瞬间照亮这座城市的真实底蕴与腾嚣其上的意识形态，什么是泡沫，什么是静水潜流。“上海帮”不代表“上海”，双方如有关系，也只是外来占领与被占领的关系。

20，毛氏黑话其来有自，因独占最高话语权，唯有他能将三套话语混合运用，瞬间切换——马克思、秦始皇、山大王。前述1966致内妇江青长信，即自状“黑话”，并不掩饰。两次在庐山，一次以“操娘”时间之长短，定彭氏反党路线之是非；一次以山大王脾气突发“无产阶级雷霆之怒”，斥骂陈伯达“跳船”。其言语之“黑”，闻之不似人君。

21，朱永嘉出狱后曾指责这场审判是“硬装樨头”——此为沪地方言，原指木匠作业，樨头不合，强行敲入，引喻为判官强势，迫人入罪。当年这一指责确有部分合理，审判本质上是政治审判，不是独立审判，更不是历史审判。朱本为史家，来日方长，可待历史之“上诉”权。可惜的是，为攻击胡耀邦庇护知识界，他认同邓氏之强权，又一次站在强权者这一边。如此，不待历史之“复议”，他已放弃历史“上诉”，自破“樨头”说，令人扼腕。

□ 原载《新史记》总第33期，2016年8月

~~~~~

## 【往事非烟】

### 清华文革的记忆

• 吴涤新 •

#### （一）

#### ◇ 四清嘎然而止，文革仓促上阵

1965年，我们射击队随同校体育代表队在延庆县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到1966年5月，突然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吹响了，四清运动只能无果而终，那些未调查完的专案，未下的结论，都一风吹掉了。谁知道我们就像狗熊掰棒子一样，扔下这个棒子又去掰下一个玉米棒子，从一个人整人的运动，迅速进入另一个更加残酷，更加惊心动魄的人整人的运动。

在回校的客车上，同学们心情无比激动，我们终于赶上一回这样伟大的文化革命。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我们年纪尚小，非常遗憾地错过了，这次可要紧紧跟着毛主席在惊涛骇浪中，增长阶级斗争的才干了。

不知是谁带头唱起了国际歌，一时间，群情激奋，热血沸腾，有的同学甚至流下了激动的泪水，还有的人已经想好了，下车要干的第一件事。在清华园大礼堂附近下车，一下车就有人出面组织，拉住了张慕津（永宁分团副团长）高国英（阜民街四清队长），就像那街头的飞行集会，大家围住他们俩高呼口号，打倒张慕津！打倒高国英！二位一下子懵了，低头一言不发。敢情被批斗就这么简单，这么容易上手。几分钟批斗完毕，然后就各自回班、回队去参加这伟大的革命了。清华园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让我不知所措，我们仓促上阵，头脑一时适应不了，就仿佛被扔进了一台洗衣机，随着波轮搅起的强烈水流，身不由己地左右翻滚，上下折腾。

#### ◇ 老兵掌权，血统开道

初期，清华园里派进了工作组，把一些怀疑工作组的同学打成了反革命或坏份子，后来有王光美到饭厅给同学打菜，再后来，有周恩来两次来清华东操场，给蒯某平反，并宣布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随后运动风起云涌，在清华园里上演着一幕又一幕的文革大戏。

老红卫兵掌权了，吹捧谭立夫讲话，推行血统论，辩论会上高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报出身！报出身！这个血统论一看就觉得无比荒谬，用现在网络语言说，是属于精虫上脑的东西。文革后的几个事实用来批驳血统论，很有说服力。朱德够英雄吧，他的孙子不也是犯了罪被枪毙了，李双江够红吧，他儿子不也是一个罪犯吗？老毛最红最红了吧？你看他孙子写的那字，就别提多丑了，真让人忍俊不禁，还到处去题字，都不觉得丢人，讲出几句话来也让人笑掉大牙，说什么对二战贡献最大的就是我爷爷和斯大林，太可乐了吧！他那个外观形象，也让人不敢恭维，吃什么会胖成这样，这种二百五的样子难道也是英雄的基因造成的吗？

当时。我对这个血统论极力反对，在日记本上写了一篇“评谭立夫讲话的反动本质”，后来到福州串联时，被某些中学生抄到了大街上。当然，这些中学生也是受血统论迫害和歧视的可怜人。血统论对中国社会造成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至今遗毒也没有肃清。

### ◇ 强撕大字报，拉倒二校门

66年八月中旬，大礼堂区的大字报，不少是针对中央干部的。8月24号的下午，我坐在礼堂前面的台阶上休息。见到一大群中学红卫兵，从北面跑步过来。把大字报区团团围住。领头的，我认识，就是我弟弟涤非他们水工93同班的马楠，号称瘦马将军，他身着高级黄绿色呢子军装，袖口露出一截白衬衣，左臂上戴着红袖章，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地指挥着这帮中学生。他认识我，目光相遇，各自无言。他们来的目的是要野蛮的撕下大字报，不让人说话。钳人之口，自来都有，但这次却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令人目瞪口呆。我依然坐着不动，瞪着他们，看尔横行到几时！

当天傍晚。马楠又与贺鹏飞一起指挥拉倒了二校门。我去晚了，那个美丽的具有欧洲建筑风格的二校门，那个具有青砖白柱的牌坊式校门，那个装饰有漂亮三拱的清华标志性建筑，就让这帮暴徒给变成了一堆碎砖头躺在地上，欲哭无泪呵！只见到一帮清华的中层以上干部在那里被人驱使着搬运砖头，稍有不如意，便有皮带伺候。

这些老红卫兵中的大多数人，对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没有认真地进行反省和忏悔，甚至有少数人还在梦想回到毛泽东的文革时代，原因就在于没有对文革进行全社会地批判和反思。瘦马将军在文革中指挥破坏清华园的标志性建筑，是一种罪行，至今没见他忏悔和道歉，这种顽固坚持文革立场的人，实在是不可救药，成为了文革的遗老遗少。

如今的教科书中，对文革这段历史都做了淡化和遗忘处理，以至今日之少年提到文革，脑中几乎是一片空白。，难怪到今天还有人认为，红色基因可以代代相传。红二代、红三代掌权，最让他们放心。一代传一代，实际是一代不如一代，谬种流传，遗害万年！

### ◇ 出身是软肋，自己寻乐趣

风卷云涌，把老红卫兵从清华舞台卷下去了。之后，又成立了八八派、八九派红卫兵，主义红卫兵，思想红卫兵，红旗红卫兵，延安红卫兵，令人目不暇接，真好似城头变幻大王旗，都说忠于毛主席。大多数的红卫兵，出身好是必须的。本来思想红卫兵准备成立一个东方红公社，打算吸收一些出身欠佳的同学，计划给他们配带方型的胸章，我盼望了一些日子，没有下文，终于也失望了。不过又想想，戴上方型胸章，不正表明你是个下等人吗。

我的出身属灰色地带，知识分子家庭，既不红，又不黑，自己都不好意思去要一个红袖章带上。张永治和我情况差不多，因此，我们俩对运动，属于不甚理解、不够得力那种人，但还没有完全逍遥，而是有机会就去参加自认为有意义的活动。比如射击队到延庆的小长征、到宣武民用炉厂去翻砂劳动、参加郭九洲联系的，到永定门机务段火车上去当见习司炉、参加机械系同学到山西灵丘县远距离的长征、和北大同学孙慧军一起骑车到天津，去宝坻县拜访小学同学，下乡知青侯隽。不承想，那次拜访使我在天津深陷囹圄（以后另有文字叙述）。

由于出身这个软肋，我几乎不写大字报，但却有一个独特的毛病，看别人大字报时，精彩之处，想赞扬，异见之处，想争论，我经常拔出钢笔，在字里行间书写一个自认为精辟的小批语，署名为无敌，这个无敌二字的署名在清华也算小有名气，许多人，见过这个批语，却不知道是谁写的，也有人用钢笔和我论战，我一般也不去搭理他们，钢笔写几个字那能说透彻。



清华红卫兵后来分裂为团派总部和414派总部。我一直坚定地为一派写批语，同学们称我为杆儿四，我弟弟涤非则被称为杆儿团。杆儿就是铁杆，坚定不移的意思。一家人，出现对立的两派，在文革中屡见不鲜。但一家出两个对立的杆儿，则有点少见了。

说到写批语，想起一个秀书法的趣事。我班同寝室的同窗胡鹏池。常常在大礼堂附近显眼的地方，贴出他的书法，他的仿毛体练得龙飞凤舞、炉火纯青，每当贴出一张，就会围了许多人看，我亲眼见到，有人怀疑是不是印刷的？于是用指甲去刮那些字，发现掉墨了，这才相信是现写的。我们射击队的石应津，非常欣赏他的书法，托我向他求字，胡鹏池就很慷慨地给她写了两张。

◇ 出手很孟浪，芷君请原谅

记得有一次在主楼往二校门方向的马路旁，老四的同学正在进行一场小型批斗会，一些同学把团派的陶德坚老师围在中间，正在批判。我刚好经过此地，只见一个短发女同学喊着，你们不能批斗陶老师，一面往里挤，想去保护她的老师。我到近处才看清楚，是我们射击队的女队员杜芷君，我赶忙上去，用两手扣住了他的两只手腕，说你不能搅乱这个批斗会，她看清是我，既没有说话，也没有挣扎，也没有愤怒，也不再往里挤了。平时我们在一个饭桌上吃饭，相处的挺好，他是建筑9字班的，平时话不多，很文静，练习也很刻苦，大家印象也都不错。几分钟后，这个飞行批斗会就结束了，我自然也就放开了她的双手。没想到，我们射击队的不同观点的男女队员，居然以这种方式有了肢体接触，要在平时早就脸红了，她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老师，我是为了老四的批斗会能继续下去。其实到今天，我也不了解陶德坚老师，不知道她究竟有哪些错误观点。当时的孟浪举动大概也是派性使然吧。奇怪的是，我抓住他的双手后，俩人都很平静，没有一点不好意思。五十年过去了，一直没有杜芷君的消息，如果能再见到她，我一定会给她一个道歉，相信她也会原谅我。

（二）

◇ 领袖尚武，百姓遭殃

群众斗群众，发展到高级阶段，必然要兵戎相见。君不见天安门上，最高统帅对宋彬彬说，要武嘛！这女孩回去就立马改名，叫成宋要武，一个女孩叫这么个鬼灵精怪、气势凶凶的名字，真是少有，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中学女校长，卞仲耘，就是在她的指挥下，命丧黄泉的。还有那个后来定性为反党集团的头子，亲爱的江青同志也煽风点火，要文攻武卫。高层如此鼓动，运动想不流血，已经不可能了。

清华一旦进入了武斗阶段，前面那些写大字报、开批判会、打嘴炮，就都化作小菜一碟。清华的百日武斗，虽然比不了外地，如重庆、广西的大型武斗，但是在首都，在中央眼皮底下，也真够残酷血腥的了。十八人死亡，三十多人终身残疾，一千一百多人负伤。在北京的高等院校里，绝对首屈一指。

六八年4月23日。清华的百日武斗开始了。武斗是由小到大，由点到面，逐步升级的。开始你占一个楼，我占一个楼，封窗户堵楼道，然后拆开暖气片，用来从楼上向进攻者身上砸，用车胎做大弹弓，碎砖头当弹丸，再往后开始焊红樱枪，再发展到了铝合金长矛，再配上盔甲、头盔，中世纪武士的装备就几乎全了。最后就是，半自动步枪、手榴弹、地雷等战争武器全都登上了清华武斗的战场。

◇ 月光惨淡，尸体冰凉

68年4月27号，为了储备粮食，在9饭厅前发生了大规模的战斗，对战中团派的一辆解放牌卡车，直接冲向老四的人群，把谢晋澄同学碾压死了，这辆卡车夺路而逃，在慌乱中被电线杆的钢制拉绳挂住了，侧翻在地，司机立刻逃跑了，老四一涌而上，为战友报仇，把汽车彻底破坏了。

当晚，我到现场去看，汽车侧翻着，气缸周边能拆的零件，都被拆光了，谢晋澄同学的尸体就躺在5号楼的西北角。我掀开脸上的白布，见到他的头皮向上挫开，露出森森白骨，面貌极度的变形，令人不寒而栗。

运动初期在二号楼，有想不开的老师跳楼，我见到在泥地上砸出一个坑来，人已经抬走了。这一回，在惨淡的月光下，在手电筒的照射下，真真切切的看到了，白天还是一个活蹦乱跳的大学生，晚上就躺在楼角成为一具冰冷的尸体。

老四占领科学馆的初期，白天还可以进出，在那里，我见到过卷缩在墙角地上的一个同学，浑身血污，一动不动，仿佛已被遗忘，大概是长矛战的伤员，也不知是团派还是四派，无论哪一派，不都是在捍卫老毛的革命路线吗？难道必须这样骨肉相残、刺刀见红吗？就不能有话好好说吗？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呢？百思不得其解。

◇ 面对杜芸，无言以答

九饭厅抢粮战斗的第二天，在河边的十饭厅门口，中饭后遇到了射击队的女队员杜芸，她是水9的，和我弟弟一个年级，她激动地一把抓住了我的两只手腕，问我，你知道昨天9饭厅的长矛战吗？一个老四被汽车碾死了你知道吗？

我知道，昨晚还去看过，那个同学叫谢晋澄，头皮都碾开了，模样好可怕。

两派都用上长矛了，都打成这个样子了，你说怎么办呢？你说到底怎么办呢？

说着说着眼泪就掉下来了。我一时无言以对，我知道杜芸的父亲是昆明医学院的院长，家境不错，这样惨烈血腥的武斗，对于一个平时就显得有些羞涩的女同学来说，刺激实在是太大了！已经让她在精神上受不了。

迟疑了一阵，我说，两派都说是保卫毛主席，却把对方视为敌人，要杀死对方，我想不通，究竟是为谁拼命呢，我也想不通，我也没有好办法，不然你还是先回家去吧。后来，她究竟走了没走，兵荒马乱的，就再也没有消息了。三十多年后，在昆明又见到她，那天劝她回家的事，还依然记得。

◇ 运动不理解，退出清华园

自那一天起，我陆续说服我们班准备留在学校坚持战斗的老四，希望不要参加武斗，万一受伤或者丢了性命，怎么向家里交代呢，究竟为谁战斗，也说不清楚。还是回家去吧。也许是我的劝说起了作用，也许是他们拿不定主意，总之最后决定回家了。我们在七饭厅借了一辆三轮车，把大家的行李装上车，由我和陈志昌同学骑车往和平里，到我家去。陈志昌第一次骑三轮车，在北三环路上，把车骑进了沟里，幸好我俩都没有受伤，几个同班的老四，在我家住了几天就陆续买火车票回家去了。

别人认为我是杆儿四，我也认为自己是铁杆。但只是用钢笔写批语的铁杆。真到了要动真家伙的时候，我就退缩了，草鸡了。所以对于留校坚持的，无论老团儿还是老四，我都佩服他们，敢于用生命和鲜血捍卫自己的观点，就算历史证明，参加武斗是错误的，主要责任也不在他们，而是要由高层号召武斗的领袖来承担。

#### ◇ 膛线模糊，子弹横飞

团派凭借蒯某的名气，在武斗中占尽优势，借着和外地造反派的关系，轻易地获得了不少制式武器。四派物资缺乏、经济困难，总是被动挨打，最后退缩到主楼一带，但仍处于被包围的态势之下。

我虽然在家里逍遥，但是心中苦闷，听到老四处境困难，科学馆人员被困，不能突围，射击队的金水高被燃烧弹烧伤了脚，都很为他们担心，也想能为学校里的老四做点什么。

从农业大学方向有一条现挖的壕沟，可以避开子弹进入主楼。在实验室里，我看到同学正在用车床给钢棒打孔，还用冲子冲出膛线。我拿起一支枪管从后端望出去，枪膛里麻渣渣的，一点也不光滑，膛线也模糊不清，要知道我们射击队员是经常看枪膛的，好的膛线应该是像镜面一样亮闪闪的，膛线从后面旋转着奔向枪口，好似万花筒中的奇妙图案，也像老照相机的快门。这支枪管的膛线让我怎么形容呢？实在是太差了，但我不能给他们泼冷水，用这样简陋的设备造枪，实在太难为他们了。我告诉他们，过几天我来帮他们试枪。

几天后，我们在楼道里摆了一张桌子，桌上固定一个虎钳，用布包着枪支夹在虎钳上，大约四十米处放了一块绘图板，在板机上拴上一根绳子，人离的远一点，是为防止炸膛。装上子弹后，我小心翼翼地拉动了绳子，一声脆响在楼道里回荡，比空旷地声音大多了，子弹顺利地出膛了，大家高兴地奔向靶板。怎么这样呢？不会吧？只见那颗子弹横着砸进了图板，侵入一厘米深，这可是用的正规的军用子弹，怎么会横着飞呢？打了那么多枪，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况，看来膛线根本没起作用，这种效果，只相当一只火药枪！试射不成功，这种枪基本不能用，没有精度、没有力量，如果在五十米内击中人体，伤口倒可能非常大，子弹提前翻滚，杀伤效果是无法想象的。造枪失败了，四派武器上的劣势始终没能改变。

试验室的同学告诉我，咱们手榴弹造的不错，说着拿出几个给我看，外观还算漂亮，木柄上T了清漆，可是没有后盖，只是用较厚的蜡纸封住后面，我想到武斗可能会延伸到清华外面，就顺便要了三颗手榴弹，藏在家中壁柜里，对谁都没有说。

#### ◇ 满天阴云，终有晴日

游离在社会上的日子，就是天天在混时间。九洲有时来我家，我帮他一起焊收音机，张永治来的多些，陪我爸下围棋，我爸的水平比他差了一大截，胜出机会很少，但仍然乐此不疲。

学校里不断传出各种消息。高校的重剑冠军许恭生在东操场武斗阵亡，我俩是一个年级的，互相都认识，英才早逝，令人悲痛。科学馆的屋顶被燃烧弹烧光，被困人员挖地道突围失败，挖掘人员被抓走，里面的伤员运不出来，粮食又告急。这些悲痛的消息令人感到没有希望，武斗何时能结束呢？清华园何时才能恢复往日的宁静？

7月27日，终于传来了工宣队进校的消息，老四主动缴械，配合停止武斗，老团负隅顽抗，还打死打伤了不少工人，终于投降了。情况究竟怎么样？想去学校落实一下，九洲、永治和我约定去一趟学校，先看一下形势再说，讲好在南门集合。

那天阴云密布，我骑车出去不久就掉雨点了，忙把雨衣穿上，很快小雨又变成了瓢泼大雨。我心中想着要在路上完成一件事，清华的武斗结束了，我留着手榴弹也没有用，交给工宣队还会自找麻烦，干脆自己处理了省事，以前没有扔过手榴弹，这次正好体验一把，骑到学院路土城附近，有一个豁口，过去一看，有一条南北方向的护城河，周围都种着老玉米，这地方不错，一个人也没有，此时天空中黑云翻滚，雷声隆隆，震耳欲聋。

我从挎包里拿出手榴弹，两个小的一个大的，先扔小的，撕开封底的蜡纸，把拉环一扯就扔了出去，轰的一声炸了，接着又扔了一颗小的，又响了，这老四造的土手榴弹还真棒！最后一颗是个大号的，为了安全，我要扔的远点，出手后大约四秒钟爆炸了，声音明显大了许多。这时我听到了一种怪异的铮铮的声音，这是什么东西在响？我抬头四处张望，只见头顶上有几条高压线通过，其中一条正在颤抖，发出声响，我的脑袋登时就大了，头皮发麻，从头发根里冒出汗来，弹片打着高压线了！我两眼发直，原地发呆一分钟，高压线要是断了怎么办？造成停电是多大的损失？我不就成了破坏份子、现行反革命了吗？

看看周围还是没有人，高压线也停止了摆动，我的心跳也渐渐趋于平缓，继续骑车到了清华南门，雨已经停了，见到九洲和永治，都说今天的雨下得好大，雷声也特别响，穿着雨衣，裤子都湿了，随后我们就一起进到清华园，学校形势大变，工宣队进校的消息是确实的。不久，大家就都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学校。进入了文革复课闹革命的阶段。

以后，每当想起那天的事情，还是非常后怕，武斗停止了，我倒是差点主动戴上个现行反革命的帽子。

### （三）

#### ◇ 结语

小小清华园的文革经历，是全国文革的一个缩影，一个传统的书香之地，也上演了斗争的最高形式，美丽的校园变身流血的战场，同室操戈、不共戴天，冷血长矛、真枪实弹。

一个清华同学孙华栋，航海队训练队长，在代表队宿舍和我住对门，身体壮的像头牛，出身不是红五类，平时话语不多，武斗期间骑自行车经过第一教室楼，被老团抓去残酷毒打，把内脏全部打坏，不到一天时间就活活把他打死了，这是多么残忍的事，俘虏还要优待，他又没拿武器，就是德国法西斯用毒气害人，还得先关几天啊！没有这么凶残，这么丧心病狂的。孙华栋的结果是十分悲惨的。

另一个清华同学蒯大富，正如我班同学胡鹏池文章形容的，他是清华园的一只蝴蝶。在校园中扇动了翅膀。它和工作组的斗争，有理有利有节，几近完美，其作用远达校外和社会，他的材料甚至影响到高层决策，为此，成为红卫兵的领袖，为最高层所赏识和重用。

但是，蒯大富有样学样，在短短的时间就学会了暴力革命的冷酷、狠毒、草菅人命，为谋权力不择手段，脑袋时时想着权，两眼时刻盯着权，双手紧紧抓住权，信奉不说谎话办不成大事，把人民日报睁眼说瞎话的本事全部学到了手。他“智擒王光美”，“不断升级武斗”，“残忍打死对方俘虏”，“广播中整天污蔑栽赃反对派”，“悍然向进校工宣队开

枪、投掷手榴弹”。从这些事已经看出，一个有本事，有辩才，有智商的学生领袖，一个原本朴实的普通大学生，一旦上了马列、毛思的轨道，并且握有一定权力之后，就必然会飞速地蜕变为一个阴险的政客、一个无耻的阴谋家，毫无选择，因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如果这种人掌握了国家政权，人民将生活在怎样的恐怖之中。幸亏蒯大富被赏识他的人抛弃了，被作为替罪羊投入了大牢，蒯同学也从如日中天，一下落到了可悲的结局。

赏识他的领袖人物，在文革运动中整遍了身边的战友，有的整死，有的整残，如贺龙、彭德怀、彭真、刘少奇、林彪、周恩来等等。同时文革的绞肉机，也害死了两千万无辜的中国百姓。最终他自己也落的个孤家寡人、众叛亲离，眼看着文革走入无法收场的境地，无可奈何花落去，心有不甘难闭眼……他死后，连老婆都成了反革命的头子，落得在狱中自挂东南枝。

文革是一场反人类的运动。其规模之大，其惨度之烈，在地球历史上绝无仅有，无论是高居庙堂，还是平民百姓，无论是革命派还是造反派，无不深受其害。虽然后来的当政者把它定性为十年浩劫，但从不敢发动群众深刻地批判这个运动，而是在历史文献中，在教科书中，尽量淡化，努力让人遗忘。

最近一段时间，在报纸、电台、网络上又有一股逆流。不让人说话，不得妄议某某，有不同看法即以文革式语言群起而攻之，网络上封号，动不动扣上反某某的大帽子，还扬言要开除出某组织。一时间，文革鬼影幢幢，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阴风阵阵，让人不寒而栗。

今日写点小文回忆文革，只缘妖雾从未清，为阻止文革回潮尽一点绵薄之力。若问文革有无一丁点好处，只能说有一点，让英明伟大走下了神坛，让“微不足道”的百姓开始清醒，破除迷信，重新评价这几十年的历史，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资讯传播的极速加快，自己也感觉到头脑更为清醒，与世界大潮流更加合拍了。

仅以此文章纪念文革中不幸逝去的同学和朋友们。

2016·3·28于燕郊，2016·9·9定稿

~~~~~  
【书刊评论】

我读《清华蒯大富》

·叶志江·

读了在香港出版的《清华蒯大富》一书。

印象深的是书中全文刊登的老蒯在一九八三年写的二审辩护词，读时有“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

一九六六年六、七月间，蒯大富被工作组关押，遭全校万人批斗，但他“又臭又硬”，声称高压政策的效果等于零。那时，全校七百个“反革命”和“准反革命”都降了，只剩他一人连篇累牍地在礼堂前的大字报区给工作组组长叶林贴公开信。已是孤家寡人，却说这棋盘上的形势对他越来越有利，要叶林三思这下一步棋该如何走。

一九八二年，他在文革初期追随毛泽东打倒刘少奇一事被指控犯有反革命罪。站在被告席上的蒯大富反问检察官：“您比我大十岁，1966年，您认为毛主席犯错误了吗？您当时已经知道林彪、江青是坏人？您从来没喊过‘打倒刘少奇’？”那几万字的辩护词更是依据法律条文的雄辩，读来相当精彩。

这老蒯，每当身陷囹圄时便才气和勇气倍增，留下可传世的杰作。可惜他当年头脑膨胀，利令智昏，对清华武斗犯有不可饶恕的罪行。

书中记录了蒯大富的一段回忆：“最难忘，叶志江同学重新挑战工作组。……他把反蒯的文章全记下来了。从7月20号我被放出来后，他就开始每天连续贴大字报，说要给蒯大富平反！蒯大富是好样的！”这“最难忘”三个字是老蒯的心里话，四十年后他在上海向我当面说过，他还说了另外三个字：“特感动”。

因为特感动，所以才最难忘。

其实，这段经历大概仅存于两个“死里逃生”的当事人的记忆中。对老蒯和我而言，66年7月下旬那段日子留在记忆中的是两个“反革命分子”刻骨铭心的生死搏斗，自然是最难忘的。

说我7月20日开始连续贴大字报，恐怕有误。老蒯是大戏中的主角，已被高层关注，所以在7月20日便“被放出来”，而我只是凭借《救鬼秘方》一文混到舞台上的丑角，仅为几个看押我的学生所关注。7月20日前后的那几天，我住的宿舍门口依旧有把守的人轮流站岗。

记得是直到7月29日后我才脱离禁闭，不是被放出来的，而是强行冲出去的。我“先礼后兵”，给看守我的学生递了一张字条，要求出去参加文化大革命。不允，再递字条，加重语气为强烈要求。“先礼”不起作用后，我便“后兵”，冲了出去。看守居然并不拦我，只是尾随我。“引蛇出洞”本是妙计，不引而自行游出洞中自然也不失为捕蛇的良机。所以，尾随是必须的。

7月25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的新闻，我大感动，大鼓舞。那几天，夏日的暴雨如注，在雨中看大字报，泪水和雨水常常一起模糊着我的双眼。我“出洞”后挥笔写了一张大字报：《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虽然照样得在自己的名字上打个红叉，且是孤家寡人一个，但已经很有点阿Q的精神胜利法，不再恐惧了。

我应当是第一个提出为蒯大富平反的学生，记得是在7月30日我贴出全校第一张给王光美的大字报——《给王光美同志的公开信》，在信中我要求光美同志承认错误，为蒯平反。

清华校友杨继绳在《从清华大学看文革》一文中说：“这天（7月29日）晚上，叶志江也贴了批评王光美的大字报。”指的就是这张大字报。在杨的记忆中，那是29日深夜，而在我的记忆中已是30日凌晨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记忆中的“一天之差”记录了文革初期那个激动人心，不分昼夜的“革命”岁月。

但我记住的并非是反蒯的文章，而是蒯大富的那些“生死搏斗”的大字报，因为我佩服他的勇气，也惭愧和后悔自己被斗时的软弱。这钦佩让我有了勇气在头上还戴着“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时去公开要求为另一个反革命分子平反。

我一向崇拜在逆境中坚持真理的人，从哥白尼到李卜克内西。文革前，听说力学系有个“反动学生”在批斗会上面对声色俱厉的批判，背着手，踱着方步，伸出食指向众人说：当年李卜克内西在第二国际遭到围攻时就是这样的！虽说是“反动学生”，但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清华蒯大富》中收录了王光美在清华被红卫兵审判的长篇记录，并注明这是“当年《井冈山》杂志社整理的”。当年我曾荣任杂志社主编，虽说是弼马温式的小官，但却为共和国主席的夫人留下了《三审王光美》这一可传世的记录，并经《清华蒯大富》一书得以流传。虽然我被打成反革命和光美同志有关，但当时细读这审讯记录，却深为王光美在沦为阶下囚的逆境中如此机智、言之有理的回答和不卑不亢的态度所折服，当即决定全文刊出。虽无胆量在按语中流露出钦佩之意，但我相信这文字本身足以自明。

几十年后，韩爱晶也不禁在书中赞叹说：“政治上处于逆境的王光美，孤立无援，是非另当别论。但她的回答确实显示出她水平不一般。”当年《三审王光美》在井冈山杂志刊登后曾引起过非议。有人批评我说，不加删改，原文照登，起了美化王光美，丑化红卫兵的作用。甚至指责我将杂志社办成了裴多菲俱乐部。看来，大多数人的读后感是相近的，只是立场不同而已。我从未有坚定的政治立场，所以往往会欣赏人性中那些与政治立场无关的美。

书中另有几处提及我。

在关于六七年一月清华学生炮打康生的章节中有一段文字：“晚上，海燕战斗队、天安门纵队不怕鬼、毛泽东思想纵队雄鹰展翅，117独立营在叶志江的带领下抄邓拓的家”，似与事实有出入。我记得去的人都是“乌合之众”，临时纠集的，大多是数力系的人，许多是逍遥派，跟着去凑热闹。说我率领117独立营倒是不错，因为这独立营只有两个兵，就是在第一张反康大字报上署名的孙常秋和陈国光两个同班同学，但那几个赫赫有名的纵队和战斗队，我指挥得动吗？

当然，如为虚张声势，或许还可以添入追杀本拉登的“海豹突击队”。

文革后的几十年中，总有人抬举我，让我在井冈山的忠义堂里谋个一官半职，或“理论家”，或“圣手书生”，每读到这类文字便免不了幽他一默。

抄家用的车倒是从井冈山兵团总部潘剑宏那里要来的。这是文革中我和她唯一的一次接触，她很给我面子，虽然有点顾忌这个行动会让总部受到牵连，但还是巧妙地帮我安排了一辆大客车，用的不是抄家的名义。听说前两年她在上海去世，我很遗憾未能去表示哀悼。

潘剑宏是清华文革中的名人，但既没有文章传世，也未听说她有什么武功被颂扬。她之出名，是因为她作为总部办公室的管家，如大观园里的王熙凤一般，长得俊俏，还将这清华园管得上上下下都很服帖。听说，不仅蒯大富得让她三分，中央文革的联络大员也对她信任有加。

书中又提到：“有人冒充大字报编委会的名义到印刷厂印了一万份《谭力夫的后台就是康生》的传单，准备次日进城散发”。这《谭力夫的后台就是康生》是我以117独立营名义写的大字报，又登在我办的油印刊物《未名周刊》上，“冒名”印刷的便是这一刊物。一万份太夸张了，这小小的刊物没这么大的发行量，说是去城里散发也是子虚乌有。是否有过如潘总管那样“冒名顶替”的事，却已记不得了，但还记得承接印刷的工人师傅模样，很

憨厚。记得是他帮我油印一事加急处理了，但还是没有赶上中央文革的反应速度，陈伯达深夜来电时，这油印刊物刚印好，还来不及发行，便被封杀，统统塞在我的床底下了。

读过高尔泰和萧默的文革回忆文章，记叙的是敦煌研究所里的那些事儿。莫高窟莫测高深，所以，几十年后高尔泰依旧在寻找家园，而萧默则苦心揣摩一叶一菩提的哲理。

几十个人，处江湖之远，却也演完了文革的全剧，几十年后的回忆也写得栩栩如生，因为都是才子。高、萧的叙述再现了文革的真实场景，也刻画了文革中的人性，无论是美丽的还是丑恶的。

但从文革的历史角度来看，莫高窟里演的只是折子戏，清华园里有几万个才子，居庙堂之高，演的才是正剧，如像高、萧二位那样细细写来，那是全新的楚汉相争，人物众多，脸谱各异，好看得很。可惜的是如有人敢像高、萧二位那样“真事真情真名真姓真时真地”地写下来，恐怕得作好亡命天涯的准备。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